

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

试解社会多元化密码

记者 王冬敏

6月5日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房宁教授做客雁山论坛，作了一场题为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》的高端报告。本报记者借此机会，就一些社会现象，对房教授做了专访。

人民听证 产生有着必然性与合理性

乐清日报：人民听证 制度在乐清实行已有7年，贵所一直在关注它。7年了，一项全新的制度在乐清得以不断探索与发展，感觉有点不容易。今天，房教授对这项制度有何评价？

房宁：乐清的 人民听证 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制度。从一种探索尝试，形成一个初步体系，已走过了7年。

人民听证 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种创新。如果过去我还不太敢说这句话，那么，今天，我就勇于把这个话说出来了。是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，勇于实践、精心探索取得的成就。应该说，这个方向是正确的，作用是积极的。对于未来人大特别是地方人大改革创新具有示范意义。

我们政治学研究所作为党中央重要的思想库、智囊团，也有责任有义务，来研究与总结乐清的 人民听证 制度。同时，我们也把它提交给全国人大，提交给党中央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也会宣传这个典型成果。当然人大制度的创新改革不止这一个，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，也不止一项，但无论如何， 人民听证 是很重要的。它对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权力配置、权力监督、协商民主这些方面，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。而且这种作用，不是锦上添花，实际上带有雪中送炭的意味。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、各种矛盾集中爆发、社会日益多元化的时候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怎么自我创新与发展，同时能

够解决社会提出的问题和挑战，就很重要。 人民听证 制度，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。这是必然要发生的，也是乐清 人民听证 做了7年还在不断地坚持和发展的原因，它有着必然性与合理性。

一些地方的制度创新，经常人走茶凉，做着做着就没有了。我希望 人民听证 能够进一步总结发展，更具稳定性、更具体系性。现在对它的研究也很重要。我们不但要知道它是怎么做的，关键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。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。

乐清日报：房教授来过乐清许多次，请您谈谈对乐清发展的看法？

房宁：乐清这个地方值得研究。日本有句谚语： 胜出必有所长 ，乐清这么一个地方，按经济学原理来讲，原来各种要素都不太充分的地方，甚至不具备的地方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它比那么多发展条件比它好的地方，发展得更好，它的价值可能在这。

过去习近平同志说过一句话，叫做 莫明其妙有其妙，无中生有有其有 ，我觉得这是一本大书，这是一个中国梦。我与大家一起在探索，我自己也在做这个工作。我想用自己的笔自己的脑，记录我所看到的乐清、温州，我所看到的中国。希望我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报告给大家。

乐清发展掌握在乐清群众的手里。整个中国还在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时期，相信未来二三十年还是有保障的。困难不是克服不了的。在经济方面，与30年前比，现在没有什么太

像样的困难。那个时候才是真困难，百废待兴。我们那么多困难都克服了，都走过来了，如果现在我们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，那太对不起我们的前辈了！有些新的问题，我们可能没有太面对，在政治、社会、意识形态思想方面，可能比30年前更复杂，解决起来更困难。我们现在应该在这方面解决更集中精力，更多解决一些问题。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每次来乐清，我都非常受鼓舞。现在我感觉乐清也在变化：在发展经济的时候，乐清市领导想了很多经济以外的事情，比如文化，比如我这次参加的 红五月 读书活动，这对于人们精神的塑造，有着很积极的作用。乐清有不少读书会，有企业家文化人为主体的文化俱乐部，有 书香乐清 等活动。这些活动，可能给人一个趋向感。过去乐清给人的印象，可能就是GDP，就是产业，包括技术，现在可能更多地展现人们的精神面貌。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格调与品味发生了变化了。我想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，看到更多的会是这些，乐清的这些企业，像正泰德力西会更发展，走向世界，但更集聚的变化，是人民的精神领域。像我参加过的三禾文化俱乐部的读书活动，它丝毫不亚于经济建设，以后可能更重要。

希望乐清经济发达，人民富裕，山清水秀，更希望在他们精神领域中，更加丰富多彩，不断取得进步。一个文明、多姿多彩的乐清，我更心向往之。



房宁教授接受专访。 记者 刘言勇 摄

腐败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

乐清日报：十八大以来，体制内反腐提速了。在腐败惯性之下，如何对官员加强监督，防患于未然，让当官不要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？

房宁：本人有幸被中纪委聘为特邀监察员，跟着中纪委与我们社科院纪检组做了些反腐败方面的研究。

腐败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出现的，各国工业化阶段，都是腐败的高发期，我们要看到一个背景，这和你的制度，和你的意识形态，和你的文化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我认为，这个关系确实不是很大。这个时候，什么制度、什么文化、什么理想信念的社会都是腐败的。主要还是工业化时期，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特别是精英阶层，主要是经济精英，迅速成长富裕起来了，那么，一些更优秀的政治精英，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，付出很多，很不容易，但是他会认为报偿不够。我们研究发现，政治精英不是欲望难填，不是说他没谱，但他就是和老板比，和经济精英比。拿自己的收入与经济精英的收入比较时，他可能会打一个折。新加坡已经把这个制度化了，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收入比例达

80%，最低为60%。你不能弄个30%啊！而我们这里，政治精英的收入恰恰与这个比例接近。这个也是腐败的大背景。

腐败有三要素，第一是动力，就是腐败的冲动与需要。这个主要是由于工业化过程中，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收入落差，是刚才说的。第二个原因，你搞工业化，你的制度不完善，这个制度有，那个制度没有，那他们就可以钻这个空子，贪腐都是这么出现的。第三个是惩罚。这点我们一直没有松动。中国之所以腐败现象还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，那实在是我们的打击具有严肃性、持续性，力度很大。

但即使这样，腐败情况还是有点严重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在某些行业，某些重灾区，真的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。

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？一方面还是得抓啊，有线索不抓不行啊！反腐败，该查就得查。

现在，全世界都在讲工业化，都处这么一个阶段上，也许过20年30年会好得多。不管治标还是治本，提高公务员的待遇还是有必要的，我还是呼吁给公务员提高待遇，减少腐败的压力和动力。

极端宗教是相对独立的思想问题

乐清日报：最近山东招远发生了邪教全能神信徒杀人事件。全能神是在东北产生，一些邪教好像更容易在贫困地区产生。你认为邪教与贫困有没有关系？

房宁：从招远事件来看，那家人可不是穷人，他们很有钱。我觉得得宗教与经济有关系。不能说极端宗教的产生，没有经济上困难的原因。但在我看来，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。现在美国是世界上邪教最多的国家，有1000多个。我国认定才10多个，也不算多。这个是发展过程中，人们权利意识在觉醒时，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，思想意识走偏了，走火入魔的结果。我认为与经济有关系，但关系不是很重要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，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问题。在这个阶段，人们在寻求生活生命意义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，就会听信一些邪说。所以全社会管理思想、管理情绪还是有必要。尽管我们加以严厉打击，但根据我的判断，这种极端宗教现象将会越来越多，一段时间难以打尽。

乐清日报：房教授，您是为数不多的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上过两次

司法独立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推进

乐清日报：您做报告时谈到了人治与法治。接下去，我们国家对法治建设肯定要加强了。但目前，我国地方政府对法治的影响甚至干预，还是很大的。司法能否独立？法院与检察院实行垂直管理，有没有可行性？这些都是我们体制内的东西，为什么不独立执行？

房宁：我觉得应该司法独立了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不叫司法独立，叫依法审判。我跟我们法律所的人都讨论

过，司法独立，是什么意思？司法实践，就是法律。这里，当然也有法官检察官的水平问题。

现在面临的还是一个提高法官、检察官水平的问题。为什么有时候要与法院通气？有时候一些法官确实一点谱都没有。像那个南京扶老人的彭宇案。案判得有多雷人啊！地方政府过问法院的审判，肯定有这回事，也有些干预是必须的，彭宇案，难道不要纠正吗？一点常识都没有。不要说

一个法官，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这么办案。

当然，我觉得司法独立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。我同意司法独立作为一个原则，一个长期的目标，是可以推进的。但在目前，显然地方党委的指导、影响还是难以避免的。推进的步子要稳妥，现在地方党委的某种干预，还是有必要的，它有消极的一面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
30年来的思潮变迁

乐清日报：房教授能否谈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思潮变迁？

房宁：我觉得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思想开放的产物。改革开放首先就是向外看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思潮，当时叫思想解放运动，主要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实践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，认为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，需要探求一种新的道路。对新道路的探索，其中不管是更激进一点的，或更保守一点的，都包括对外国的一种渴望，眼睛都是向外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有一种社会文化思潮，从刚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，否定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做法，到否定怀疑我们自己的整个社会主义道路，甚至连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追求民族独立、民族富强的努力，都被怀疑了。所以当时最严重的是全盘西化派，他们连原罪一直追到把康有为梁启超都给怀疑了。

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潮，从要求变革到自我否定，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，就有了一个空间，大量西方的思想就来了，充斥着我们的生活。应该说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是西方各种思潮的一个市场。所有的学说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听众和粉丝，包括宗教。

接着就是苏东剧变。如果说放弃社会主义就会好起来，但苏东的剧变

并没有证实这个可能。而尽管人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可能有怀疑，中国大量的人，包括乐清企业家，走出去一看，那样搞不行。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国家的未来了。

所以当时，就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潮。其实民族主义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意识形态。它的基本思想，就是求得民族复兴。中国与西方是有对立的，特别是1989年以后。民族主义者把他们自身的逻辑，变成与西方对抗的思潮，甚至是反美反日。但民族主义很难说有一种很系统的理论，支持民族的建构。

当然，主流思潮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在苏东剧变之后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提高了。当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，证实了这点，包括外国人在中国的调查，其实结论都差不多。中国稳定了，人们对中国的制度、中国共产党，认同度高了。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，作为一个补充，某种程度上，得到了官方的认可。

同时，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，我国强调市场经济，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线索并没有断。南巡讲话以后，它就以推崇市场经济、政治、经济自由化再次浮出水面，在高校特别明显，这个叫新自由主义。

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的不同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治国理